佛教青年對現代經濟社會應扮演的角色

／吳永猛

（本文爲世界佛教青年友誼會一九八五年研討會宣讀論文）

作者簡介：
吳永猛博士，字濟寬，現年四十七歲，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經濟系畢業，中國文化學院碩士、博士班畢業，民國六十三年榮獲國家法學博士學位，曾任日本天理大學客座教授、中國文化學院副院長等職。現任中國文化大學夜間部會計系主任、本社社長。

一、前言

由於人類力求種族的延續、生命的滋長，務須努力工作，奮鬥不懈；又因人類的慾望無窮，而社會的資源有限，如何運用這有限的資源來滿足那無限的慾望？因而即有所謂「經濟行爲」的發生。自古至今，經濟社會的發展過程不外是：採集→漁獵→遊牧→農業→工商→……一路走下來。這一趨向的步驟就有快慢之分了。

西元一七六〇到一八三〇年，英國產業革命成功，捷足先登，步入工商業社會之門，深受其他歐美各國所羨慕。因此以英國爲首的工商業社會，樹立起近代資本主義的模式，古典學派的經濟學思想也應運而生。時到今日，舉世各國無不謀求現代化，也就是想盡辦法擺脫農業社會的藩籬，而步入工商化的社會。

西元一九〇四到一九〇五年，德國社會學家韋伯（Max Weber）發表「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」，他認爲資本主義曾經在羅馬、巴比倫、中國和印度的社會萌芽，但這些地方因沒有把它導向合理化，所以沒有發展成爲資本主義社會；而耶穌教加爾文教派的倫理，却樹立起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的精神。他特別以英國爲例，說明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清教的倫理有關。

西元一九一五年，韋伯又發表「儒家和道家」，一九五一年被譯成英文「中國之宗教——儒家和道家」。韋伯當時認爲東方的宗教，如中國的儒、道兩家，與現代資本主義精神格格不入，所以中國沒能建立現代資本主義社會，言下之意是說無法使工商業社會現代化。時到今日，這一論調是有偏頗。（註一）又一九一六到一九一七年，韋伯再發表「印度教和佛教」，也有同樣的論調，當時也引起一番爭論。（註二）

過去不但韋伯，就是一般學者（註三），都會誤認爲只要是儒、釋、道傳播的地方，經濟社會將是落後的。這一見解，如對過去的歷史稍加研究，諸如對中西方宗教的寺院經濟發展略加比較，就會免此誤解。如果對過去的歷史怕麻煩，不去追溯，那就看看今天東方的日本、台灣、南韓、香港、新加坡等地，凡是儒

家和大乘佛教傳播的地方，其經濟社會發展毫不遜色，一樣可與西方資本主義發展下的現代自由經濟社會一較長短！

因此，本文將就「佛教青年對現代經濟社會應扮演的角色」爲題，提出一點淺見。而擬出底下幾點，加以申述：

1.現代自由經濟社會的特徵：分別敍述其優劣點，讓我們因應取捨的時候有所選擇。

2.佛教對過去經濟社會的貢獻：從過去的歷史，說明佛教對當時經濟社會的貢獻，尤其是慈善事業的成績更爲輝煌。

3.佛教青年對當前經濟社會應處的態度與作法：就佛教的哲理與宗教的情操，對過去的成就、現在的問題、將來的理想，應深具信心，面對現實，脚踏實地，而有所表現。

二、現代自由經濟社會的特徵

的確西洋近三百年來科技一路領先，工商業社會的所得節節上升，物質文明超越前進。他們所以有這麼特殊的發展，不可否認的，自由經濟社會有一些觀念與作法是發揮了作用。但任何事情都有正負、利弊、得失；自由經濟社會有它的正面，能在合情合理的情況之下，以民主方式，發揮了每一個人的潛能，促使經濟社會突飛猛晉。但也因而發生不少副作用，腐蝕了它的碩果。茲就其優劣點，分別列述如下：

㈠優點

1.私有財產

在自由經濟社會，皆肯定個人私有財產的存在，對個人的生產、消費、交換、分配等經濟活動，都有自我處置的權利。所以每一個人都竭盡所能地去謀取屬於自己所有的財富，因而整個社會很快會繁榮起來。這就是十八世紀後期的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（Adam Smith,1723-1790）所認爲的「私利即公益」的理想。這是符合人性的本能。

2.經濟自由

最具有現代自由經濟社會特質的，就是「經濟自由」了，因現代自由經濟社會尊重與發揮「經濟自由」，不外：企業自由、就業自由、消費自由。每一個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意願去從事生產，按自己的能力去找工作，按自己的願望去消費，這樣發展下去，使得整個社會蓬蓬勃勃，活躍起來。因而自由經濟社會更需要講求信用、守時、守份，用複式簿記、合理化的對等往來；這正如韋伯所說的資本主義精神所在。

3.自由競爭

競爭的市場，優勝劣敗，每個生產者要想生存而不被淘汰，務必提供價廉物美的產品；所以要想盡辦法降低成本提高品質，它有助於自由經濟社會的生產效率提高，促進技術進步。自由競爭，企業不能壟斷，爲自己生存務必奉消費者爲其衣食父母，以消費者的意願爲依歸，而達到合理化的公平交易。公平競爭，企業者有合理的利潤，也維護了消費者的福利。

4.價格機能

爲維持自由經濟社會的市場功能正常的運作，價格機能成爲經濟活動的工具，正如亞當斯密所說的「一隻看不見的手」（the invisible hand），在整個社會指揮若定。只要充分發揮價格機能的運作，供需雙方自由討價還價，供需雙方對價格的決定視數量的多寡而升降自如，水漲船高，自然流露，不必加以干涉，如此最合乎大家的利益，而達到市場的公平競爭性。

㈡缺點

1.個人主義太濃

工商業社會講究追逐個人利益，不錯，因而社會經濟發展很快，利之所在人人必爭，個人私利也激發了其潛能的充分發揮。但人的慾望無窮，貪得無饜，將導致唯利是圖的功利想法；社會上人人只求個人蠅頭小利，人人爲己，無法達到「私利即公益」

的奉獻境界。以致整個社會貧富不均，在個人主義的利害關係之下，冷酷無情。

2.經濟倫理薄弱

經濟倫理是研究經濟行爲的合理化。但在自由經濟社會發展過程當中，是有不少偏失。如只顧個人私利，在生產上會導致粗製濫造，在交易上會演成欺榨蒙騙；在消費上屢見品價不實；在分配上壟斷獨霸自飽，使得社會上人人自衞，弱肉強食，經濟倫理喪失。

3.自然資源浪費

經濟科學是研究社會有限資源的合理化運用，想如何充分發揮經濟效率。但由於自由經濟社會運作有偏差，以致富者愈富，貧者愈貧。富者之物質享受往往太超過，而暴殄天物，貧者又無立錐之地。今天世界上有所謂東西問題、南北問題，就因此而來。由於自然資源想盡辦法加以開發，爲大量生產大量消費，導致浪費。豈知自然資源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，如一九七四年以來已有二度世界性的能源危機發生。

4.生態平衡失調

由於工商業社會的來臨，人口聚居的大都市愈來愈多，工業區的規模愈來愈大，而產生垃圾、污水、廢氣、塵烟等大量殘餘，任意向山川、大地、空中、海洋等大自然界排棄而構成污染。乃至爲農作物的生產大量使用農藥，爲捕獲魚蝦而使用電捕與藥物，毒死鄰近大小生物，致使自然界生態失去平衡。因果循環，人類也自食惡果。

三、佛教對過去經濟社會的貢獻

自從釋迦牟尼佛以一大事因緣降生於世之後，佛教已有二千四百餘年的傳播，可說後來兩大文化古國——印度與中國都深受其教義的影響。亞洲地區凡吃稻米的農業社會都信仰佛教，也就是說，在當時先進的農業國家的生活規範都與佛教息息相關。

從過去歷史記載，佛教徒在經濟社會所辦的事業繁多，尤其是大乘佛教傳播的中國、韓國、日本等地，更不勝枚舉。又從佛教傳播的歷史可得一見證，只要那一朝代佛教興盛，也正是佛教徒參與經濟活動最多的時候，茲舉例說明於下：

㈠印度佛教教團對經濟理念的發展，約可分爲三階段，茲分敍於下：

1.初期：佛教教團形成最初期，仍秉承世尊的遺訓，出家僧人專心修行，禁止生產活動，可說完全無經濟行爲的發生。此時約西元前三世紀的孔雀王朝時代。既使有在家信徒供養金銀貨幣，即行埋棄；因原始佛教以貨幣爲不淨之物。

2.第二期：佛教教團成爲共住團體，也慢慢變成了共住的家。出家修行者雖守「手不拿貨幣」的戒規，但信徒供養的貨幣可拿來交換衣物日用品，作爲物物交換的貨物一般，作爲共信之用。故此時已有消費活動，這是教團經濟理念的一大變化。

3.第三期：世尊圓寂後一世紀，在北印度商業都市的佛教教團，其修行者爲適應社會上的變化，而唱出「金銀淨」的主張來。所謂「金銀淨」，就是教團可把金銀貨幣儲蓄起來，營運生利，從此發展成借貸功用。此後，教團所有的金錢即稱爲「無盡物」、「塔物無盡」。大衆部派、大乘教團也因而展開，僧伽團的經濟活動範圍也擴大。（註四）

㈡中國佛教經濟的發展（註五）

如以後漢時代佛教傳到中國開始算起，一路發展下來，當有傳播期、興盛期、壯大期、融合期等階段的發展。佛陀雖然在印度出生，而眞正大爲宏揚佛法，尤其大乘佛教的事業，是在中國，今天中國保有中文版本的三藏十二部，浩如瀚海的佛教大藏經典，就是最好的證明。佛教在中國經濟社會曾經扮演重要的角色，茲略舉敍述如下：

1.後漢到三國時期：因是佛教傳播初期，未普及民間，當時的僧伽都接受禮遇供養，僅見慈善事業的端倪而已。

2.南北朝時期：因時局動亂，佛教普及民間，寺院盛況空前，「天下名山僧占多」，集聚人力財力，佛教辦了不少事業，對當時的社會民心貢獻良多。其慈善事業諸如：僧祇粟、孤獨園、疾館、藥藏等等。

3.隋唐時期：佛教已在中國生根滋長，各大宗派紛紛成立，尤其唐代禪宗甚盛，叢林寺院制度之建立，自食其力的大乘佛教樹立風範，興創不少事業，有些甚至是當時社會的領先者。諸如：無盡藏院（金融事業）、悲田與養病坊（慈善事業）、搭會、拍賣、典當、碾米、旅店、出版等多彩多姿的事業，與宏揚佛法工作，能收相得益彰之效。

4.宋元時期：佛教到了宋代可說已中國化了，已融合成中國文化的一環。當時社會的救濟工作，政府的荒政、社會的慈善事業，幾乎均由佛教徒來做。諸如：養濟院、安濟坊、孤老院、漏澤園、藥幼局、施藥局、質庫等，無所不辦。元代除延續宋代的規範之外，甚至有製鐵業、銀鑛業等生產事業的經營。

四、佛教青年對當前經濟社會應有的態度與作法

當我們看到近世西方科技文明突飛猛晉，經濟社會所得節節高升，生活物質大量生產大量消費，很像這個世界是爲他們所有似的。但曾幾何時，短短半個世紀就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，眼看他起高樓又眼看他樓塌了。如再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，全地球將毀之一旦。這不是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，也不是杞人憂天，而是很可能發生的事。因此有識之士已感到物質文明的恣虐猖狂，膩噁透了這科技文明所帶來的恐懼，正渴望再一親自然的溫潤與安詳。其實盲從與恐懼都不是辦法，我們在前面已探討了現代經濟社會的得失。現在我們要用佛法轉識成智的辦法，因佛教在過去社會裏有很豐富的經驗，佛法不離世間法，面對當前社會的得失，如何發揮潛移默化的影響力，一方面促進經濟成長，一方面拯救偏失。凡我佛教青年深具現代知識，對當前經濟社會應以怎樣的態度，又如何去親自勵行，才能爲社會、爲國家，乃至爲全世界衆生謀求和平的貢獻，茲略述一二，以資參攷：

㈠出世與入世之間的橋樑

原始佛教的出家人，爲專心修道，作人間師表，不事生產，只是托缽，接受供養。因僧人外出托缽，順便可宏揚佛法，在農業社會，此方法很好。

但到了今天工商業社會，出家僧人已無法再靠托缽供養的方式。早在中國佛教發展史上就有所變化，如魏晉南北朝時代，出家僧伽可以不事生產，只接受信徒供養。到了唐宋時代，僧伽要自力更生，禪宗的叢林生活就是最好的例子，爲因應社會變遷而佛法又能繼續宏揚，如「六祖壇經」上記載六祖慧能在寺院工作也等於修行，甚至於六祖慧能還認爲善男信女可離開寺院回家修行。「百丈清規」是百丈禪師所立的規範，主張「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」。這是佛教爲適應當時中國經濟社會所作的調整，這樣一來，禪宗在唐宋時代大興，叢林也辦起不少生產事業，有的還帶動了當時農業社會的風氣之先，如「無盡藏」、「櫃坊」、「質庫」等，成爲當時金融業的領導者（註六）。因此佛教寺院在當時也扮演福利事業的重要角色，讓社會人士敬佩，這是叢林之能在唐宋時代大盛的經濟原因。

由禪宗叢林發展的例子，說明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之事，擇善固執，可達上下雙廻向交撓提升的目的。今天佛教青年應本著這一經驗，面對現代經濟社會，以宏揚佛法的心情，選擇有利人世的事業脚踏實地去經營；也就是扮演成出世與入世的橋樑，努力奮鬥，力求自度再自度，度人再度人。

㈡因果律與合理性的提示

任何事情的發生都有前因後果，佛法所談的因果，還遠及三世因果，是指時間的過程有過去、現在、未來。如以一生爲例：

昨天就是指過去，往上溯及父母、祖先，包括自己未出生以前無量世中所做的行爲；今天就是現在的報應；明天就是未來生命結束以後，所會接受到的一切情況。所以佛教講「業」、「因果」、「輪廻」，都很徹底。

我們看看今天自由經濟社會，爲一時之快，要達成享受，而相對的產生不少弊端。在這利害得失之下，人類要衡量一下：對「國民生產毛額」（gross national product）GNP 與「全國污染毛額」（gross national pollution）GNP 之間的得失如何？社會成本是否等於社會效益？

雖然今天對經濟成長與污染問題已有維護標準，政府會定下辦法公平合理的加以維護。但行之於法，總是對外形加以管束而已，可見今天每日有多少傷風敗德的社會新聞在發生，光憑法律的力量無法抑止。爲糾正這世道人心的偏差，我們佛教青年應有足夠的智慧來傳播佛法的因果律眞理。從世俗人心的根柢建立起，使之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，如世上人人努力經濟成長都能了解佛法因果報應的道理，善業有善果，惡業有惡果，屢見不鮮。我們爲享有經濟成長的碩果，可要維護標準，合情合理合法去努力生產，才是正途，本著「正德、利用、厚生」的原則去做。提示大衆一切經濟行爲都有因果律，要合乎佛法的「八正道」（正見、正思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精進、正念、正定）才行。

(三)經濟效率與經濟倫理的配合

經濟學所研究的重點，在於經濟效率的提高。因社會資源有限，人類慾望無窮，如何利用有限的資源來滿足無限的慾望，樣樣要講究效率。所以在私有財產體制下，必定主張自由競爭，也就是自由市場中供需雙方斤斤計較，討價還價，認爲是天經地義的事。爲什麼公營事業比不上民營事業的效率，原因很簡單，由於民營事業利害得失繫於一身，務必全心全力以赴，當然效率高；反之，公營事業人人皆有被雇的感覺，一個口令一個動作，不會自動自發，即顯得效率差。可見一切經營動念，在乎「一念心」。

中國古訓所謂「精誠所至，金石爲開」，佛教所謂「一心不亂，無事不辦」。對「心」的探究，就是修行的方法，佛家有四萬八千法門之多，視每一個人的契機而入道。當今佛教青年應把這一道理推演到現實的經濟社會來，只要能把握「一心不亂」，即能提高工作效率，正如日本有「禪的管理」一樣，廣受社會歡迎。

講求經濟效率，既然是把握「一心不亂」的修爲。人生禍福也繫於一念，效率愈高，道德愈好，造福才會愈大。近年來西方經濟先進國家的有識之士，又把經濟效率與經濟倫理重新評估（註七）。至於經濟倫理如何配合，佛教除了講「八正道」之外，更要發揮六度波羅密的精神。其如何配合，茲敍述於下（註八）：

經濟倫理
（下化衆生建設）
分配—布施（施與）
消費—持戒（節制）
交易—忍辱（寬容）
生產—精進（精勵）
禪定（瞑想）
智慧（悟道）
自我解脫
（上求菩提成佛）

因此，佛教青年應把握「一念心」，提高經濟效率，發揮「八正道」與「六度波羅密」的精神，提升經濟倫理，下化衆生，上求菩提，作爲社會的楷模。

(四)提高所得與慈悲喜捨的作法

要改善生活水準，提高所得是不二法門。古人說「開門有七事」，每一樣財貨都需要用金錢去買得來。擁有高所得而使生活物質不致匱乏，乃現實人生不可厚非之事。管子說：「倉廩實則知禮節，衣食足則知榮辱」。所得可改善生活素質也是不爭的事

實。故合情合理的賺錢，並沒有什麼不好；尤其是自由經濟社會，把獲得「正利潤」的賺錢者，認爲是用心努力服務的成功者，是受社會的讚賞者。反之，把「負利潤」的虧本者，認爲是不用心不努力的失敗者，將是受社會的懲罰者。而貧窮就是罪惡之說，致使現實人生，人人變得忙忙碌碌，唯利是圖，永不知足，那也是一大偏失。

個人是社會的一份子，取之社會用之社會，應時時有回饋社會的心，有多少能力就奉獻多少功德。佛教最講求慈悲喜捨，即憐憫心，人饑我饑，拔苦與樂。所以，佛教青年應多一分努力賺取高所得，同時爲衆生傾注不盡的慈悲，可知「六度波羅密」，布施列爲第一呢！

五、結語

綜上所述，可知經濟發展已到了工商業社會，每天過著熙熙攘攘的忙碌生活，已回不去農村社會的寧靜了。我們佛教青年應面對現實，瞭解自由經濟社會的優劣點，擇善固執，不隨波逐流，深具「戒、定、慧」的涵養，一方面能創造事業，一方面能宏揚佛法。

在過去的農業社會裏，佛教大德因應有方，既創造慈善事業，又宏揚佛法，叢林興盛，佛光普照。這給我們當今佛教青年一個最好的啓示。我們應效法過去佛教大德的風範，事不分大小，作出一番利己利人的事業來！

總之，佛教青年對當前經濟社會應處的態度與作法，在觀念上應把握著：①作入世與出世之間的橋樑，②隨時隨地提醒大家要有因果律與合理性的觀念，③應把經濟效率與經濟倫理相配合，④提高所得與慈悲喜捨同時並進。積極參與經濟活動，有選擇性的創造淨業，棄除惡業，宏揚佛法。

附註

註一：關於韋伯的「中國之宗教」與現代資本主義發展的爭論，最近有：黃進興「古典的回顧——論韋伯的（中國之宗教）兼及（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）」，民國七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，「中國時報」連載三天。余英時「韋伯觀點與（儒家倫理）序說，民國七十四年六月十九日，「中國時報」登載，接著余英時又有演講文「儒家倫理與商人精神」，民國七十四年六月二十日，「聯合報」連載二天。皆指出韋伯的誤解。

註二：關於韋伯的「印度教和佛教」的爭論，見於中村元「東洋の宗教と經濟倫理」，指出韋伯的誤解，昭和三十年十月，「心」八卷十。

註三：唐慶增著「中國經濟思想史」，頁一六—一九，列舉中國經濟思想不發達的原因凡六，其中就明列老莊與佛教，清靜虛無，不生產而食於人，皆足以妨礙健全經濟思想的進步。見民國二十五年三月，上海商務印書館初版。

註四：「人生と佛教」，第七册「佛教の經濟觀——財と勞動の價値」，宮坂宥勝著，頁三四，東京，佼成出版社，一九六七年。

註五：吳永猛撰「中國佛教經濟發展之研究」，台北，文津出版社，民國六十四年。

註六：同註五，頁二六—二七。

註七：十九世紀末，古典學派的經濟學家，把實證經濟（positive economics）與規範經濟（Normative economics）分開，認爲經濟學只要研究實證經濟問題即可，規範是倫理道德之事讓哲學家去研究。但時至今日已有偏失之感，又有提倡兩者應再配合研究。見吳永猛「規範經濟方法的探討」，華岡大夏學報，第一期，民國六十九年。

註八：吳永猛撰「經濟倫理學概要」，頁六二，台北，銀河出版社，民國六十五年。